

《大公报·医学周刊》对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洪传安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摘要] 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是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丙寅医学社创办的《大公报·医学周刊》是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地区的重要医学刊物,自1929年至1937年,该刊持续倡导学习国外卫生管理经验,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并在此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公共卫生的重要阵地。该刊刊载了133篇相关文章,不但传播和普及了公共卫生相关知识与内容,同时也客观记录了当时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再现了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努力。

[关键词] 《大公报·医学周刊》 公共卫生 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5.013

1 《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创办及其宣传公共卫生的背景

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北平创办协和医学院,并将在中国发展“科学化医学”和培养“中国医学的未来领导者”确立为其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这样的办学理念,直接促成了医学院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协和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力量^[1]。

1926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以陈志潜、杨济时、贾魁以及诸福棠等人为代表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学生,发起成立了丙寅医学社,并将“评论社会医事,传播新医知识”作为医学社的活动宗旨。丙寅医学社成立当年,医学社社员即致力于医学传播工作,其

中,最早的传播工作当属创办《医学周刊》。自1926年到1929年上半年,丙寅医学社先后与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新中华报》合作,将《医学周刊》以副刊的形式刊登在这两份报纸上,后因各种原因停止合作。1929年,丙寅医学社转而与天津《大公报》合作,以《大公报》为载体创办《医学半月刊》,后改名《医学周刊》。

《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它是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地区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之一,也是我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926年,吴鼎昌等人组建“新记”公司,在天津接手《大公报》,并发展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始终坚持舆论独立和

收稿日期: 2017-05-2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FRF-BR-16-007B)。

* 通信作者: E-mail: zhangmeifang@ustb.edu.cn。

言论自由^[2]。而丙寅医学社所追求的，亦是这样一种独立和自由的舆论氛围。陈志潜在《发刊漫谈》一文中谈到：“不过为完全迎合心理而立言，丙寅医学社同人所不为，大公报馆亦宣言所不收。这是我个人最觉欣悦的一点。”^[3]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部分报纸的专刊和副刊成为激进知识分子宣扬民主和科学，传播新观念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为迎合读者需求，新记《大公报》也相继推出属于自己的专副

刊^[4]。此时的《大公报》，并未有医学类副刊，这也成为丙寅医学社和新记《大公报》合作的契机。丙寅医学社与新记《大公报》的合作持续了八年，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公报·医学周刊》才被迫停刊。从1929年到1937年，《大公报·医学周刊》共发行了406期，刊文1000多篇^①，凭借丙寅医学社的专业素养以及《大公报》的影响力，《大公报·医学周刊》在这短短的八年时间，发展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重要的医学刊物。

从1929年创刊至1937年终刊，陈志潜一直担任《大公报·医学周刊》的主编，他自幼便有学习西医的愿望，在协和求学期间，受美籍公共卫生学家J. B. 兰安生（J. B. Grant）的影响，萌生了投身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想法。陈志潜鼓励学习西方医学特别是西方公共卫生学，他本人也曾多次在《大公报·医学周刊》上发表文章，阐明在当时中国开展公共卫生建设的紧迫性。除陈志潜外，杨济时、贾魁、朱章赓等丙寅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也均致力于传播西方医学，他们同时也是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多次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传播新医知识。此外，医学社外的主要撰稿人，诸如吴霁棠、朱宪彝、胡懋廉以及庐永春等，均是当时中国知名的西医卫生界人士。显然，丙寅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和撰



图1 《大公报·医学周刊》版面图

①多次出现的同名连载文章统一只算作1篇，下同。

稿人深受西方医药卫生理念的影响，也深谙学习西方医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极力支持西医传播工作。在《医学五化论》一文中，朱章赓阐述了当时医学的五化问题，即科学化、学术化、民众化、社会化和国家化，这五化同时也是丙寅医学社医学传播工作的方向，因而，西医日常卫生保健常识、疫病防控知识、西医理论技术以及公共卫生、医护职业、医药卫生教育等问题成为《大公报·医学周刊》关注的重点。在这五化当中，社会化和国家化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医学应为民众造福，国家应对国民健康负责的理念，换言之，即国家要通过公共卫生的建设保障国民身体的健康。20世纪20—30年代，公共卫生建设普遍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成为丙寅医学社宣传的重点，这与甲午战后医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医随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并不断地冲击着中医的地位。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一个批判旧文化和学习西方新文化的自我反思阶段。在医学领域，中医开始势微，而西医则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倡导下，作为强身健体之首选，担负起保国保种，救国救民之重任。此时，西方诸国的卫生建设与中国卫生行政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而日本维新发端于医学改革之事实又为精英分子所瞩目，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医疗明显优胜之处，是公共卫生和保健的知识和制度比中国进步”，因此，建立在传染病学基础之上的公共卫生学成为医学现代化的一个焦点^{[5]69, 75}。20世纪初，西医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公共卫生建设也逐渐上升到国家的高度，1916年至192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励行公共卫生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

展。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并于同年在南京设立卫生部，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公共卫生建设正式纳入国家建设范畴。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社会上也掀起一股励行公共卫生建设的热潮，倡导公共卫生，加强卫生管理成为当时中国医药卫生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医学社会化之进程逐步加快。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医界的知识精英自觉顺应医学社会化的潮流，励行公共卫生建设，以图提高国人的身体健康水平，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由协和医学院学生创办的《大公报·医学周刊》对公共卫生的宣传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2《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传工作

在医学社会化的进程中，丙寅医学社深谙“卫生工作之目的，在使社会人人享受健康之幸福”^[6]，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依然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其时中国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较之日本及欧美国家确有较大差距。统计资料表明，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30‰，同时期日本及欧美各国的人口死亡率仅为10‰左右，天花这种可防可治的疫病在我国的死亡率为3.53‰，而在英国的死亡率仅为0.12‰^[7]，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不甚乐观。陈志潜提出，当时中国虽然有成千成万的医生，但华北农村里百分之四十五毫无任何的医药设备，就连上海这样一个拥有六千多医务人员的大都市，到了每年霍乱流行的时候，也成为了霍乱的大本营，而且“医师的诊费贵到每次四元八角至二十八元”^②，如此昂贵的费用，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就造成了“有医师也不能维持社会

②《我国急应实施公医制度》一文发表于1933年，据匡丹丹《上海工人的收入与生活状况（1927—1937）》一文，1927—1937年这十年间，一般的上海工人家庭年收入在200—400元之间。

份子身心的治安”的状况。最后，陈志潜更是直言：“旧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合今日生活的实际，若不及早撞破，来创造新方式，国家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国运的前途实在是危险万状。”并以此呼吁建立全面的公医制度^[8]。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丙寅医学社励行公共卫生建设之愿望，也表达了其试图用医学去救国的期盼。

丙寅医学社励行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以《大公报·医学周刊》为平台，向民众宣传公共卫生建设。梳理1929年至1937年的《大公报·医学周刊》，笔者整理出有关公共卫生的文章共133篇。撰文者，除了丙寅医学社的陈志潜和朱章赓外，大部分是医学社外的医界人士，如吴霁棠、庐永春、猷先、俞焕文和刘瑞狱等。从数量上看，这些文章占到《大公报·医学周刊》发表文章总数的11.36%，除了1929年和1937年因办刊时间不足一年导致文章数目较少外，其他年份文章均达到10篇以上，文章数目最多的1934年，更是达到了23篇（见图2）。从内容上看，这133篇文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倡导公共卫生，着力构建公共卫生之形象，反映各种卫生问题，表述公共卫生建设之重要性；第二，介绍国外卫生管理经验，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三，对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这三部分内容也恰好反映出其宣传公共卫生的三个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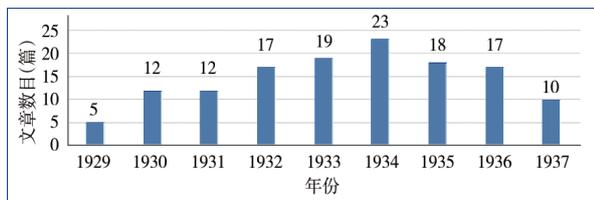


图2 《大公报·医学周刊》历年宣传公共卫生文章数目统计图

2.1 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

丙寅医学社宣传公共卫生的第一种方式是倡导公共卫生。朱章赓曾提到，“医学底目的，既为民众健康之保障”，而“政府的一切

设施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因此，“求社会任何阶级的人都能享受同等的医学设施，要实现医学社会化，必先实行医学国家化不可”^[9]。而此处所谓的医学国家化，即是公共卫生建设。因此，倡导公共卫生建设，论述其对于国民健康的重要意义并突出国家应对国民健康负责成为丙寅医学社宣传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从统计结果来看，《大公报·医学周刊》涉及倡导公共卫生的文章52篇，这些文章大部分着力于直接论述公共卫生之重要性和必要性，呼吁中国必须要加快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让医学肩负起救国救民之重任。相应的文章有《卫生行政》（第76期）、《我国急应实施公医制度》（第181期）以及《公共卫生与人类幸福》（第247期）等。

例如《公共卫生与人类幸福》一文，开篇便如此论述公共卫生的意义，“公共卫生的目的在于：一、改良社会卫生状况，以预防疾病，减少死亡；二、提高民众健康程度，以增强其生活力，充裕社会经济，换言之，公共卫生就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工具。社会自有公共卫生以来，迄今不过五十余年，而在这短时间，公共卫生替人类所谋的幸福，实在是不胜枚举”^[10]。又如《北平市第一次卫生动员大会袁市长演说词摘要》，该文作者在阐释卫生动员大会的意义时说到，“我们中国人，人家给我们一个‘东亚病夫’的绰号……这个东亚病夫的绰号，我们当然要想方法去掉。但是要强国，就要先强种。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无健康，基础即无法巩固”，因此，“我们要人民健康起来，除了提倡卫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11]。

另外，还有部分文章着力于展示具体的公共卫生问题，内容涉及日常公共卫生问题和卫生管理缺失问题两方面，尤以展示卫生管理缺失问题为主，相关文章有《由急赈想到市政》（第201期）、《夏令游泳与公共卫生》（第255期）以及《北平牛乳管理问题》（第

387期)等。如《由急赈想到市政》，作者在文中谈到，北伐战后，对于北平的灾民赈济，“中央原定有卫生一项，近以急赈可以包括卫生，卫生不能包括急赈，所以改为急赈”，然而，这样的改变令作者觉得“现在一般市民所享受到的卫生利益，也太觉不足了，北平的人口有一百四十余万，居然连一个相当的传染病医院都没有，比起其他的文明国家来，我们简直的不如人家的猪狗啊！”由此，作者呼吁，“战区民众所应享受的卫生设施不应当仅限于急赈，而应该有一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趁着这个机会建设起来”^[12]。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医学周刊》虽然创办于1929年，其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也集中在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颁布之后，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公共卫生宣传工作是受到国民政府政策的推动所致，早在丙寅医学社与《大公报》合作之前，丙寅医学社即着手宣传公共卫生建设。在此之前，丙寅医学社认为，现代医学是民众的医学，所以医界要把现代医学送到民间去，使得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点利益，同时，在他们看来，国家应该对民众健康负有责任^[13]。因而，他们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可以看做是其自觉顺应近代医学社会化的表现。

2.2 对国外卫生管理经验的学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多舛，积极谋求向国外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方式之一。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丙寅医学社同样尝试着宣传国外的卫生管理经验，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借鉴。对于这点，朱章赓曾谈到，“每听人提起公共卫生，就感觉到我国是落后了；学识方面，技卫方面，还不如欧洲先进诸国”，因而，他希望能把“考察欧美卫生行政所得到的，来和各位谈谈；或可供各位热心同志的参考”^[14]。

《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公共卫生的文

章中，介绍国外公共卫生建设经验的文章有30篇，涉及苏联、美国、日本、英国、波兰、奥地利、墨西哥以及法属安南等国家和地区。而从内容来看，这些文章的涉及面相当广泛，主要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食品卫生管理、疾病管理、军队卫生管理、卫生部门制度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经验以及公共卫生与学术建设等。相应文章有《新墨西哥水灾时防病的经验》(第104期)、《参加美国公共卫生学会拉杂谈》(第122、123、126期)以及《苏俄的抗痨运动》(第127期)等，这些文章在介绍国外的卫生管理经验时，均提及了公共卫生对于预防疾病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意义。

例如《新墨西哥水灾时防病的经验》一文，借该国政府的水灾防疫经验总结了几则水灾防治传染病的处置事项，即在发生水灾时，应当注意饮水之卫生、排泄物之处置、食物之卫生、接种疫苗以及病人之处置^[15]。又如《参加美国公共卫生拉杂谈》一文，作者在文中提到，美国公共卫生学术在改善卫生条件和推进卫生行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建议公共卫生行政应该要跟公共卫生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公共卫生建设的规范化^[16]。再如《苏俄之抗花柳病运动》一文，肯定了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自上而下、全民动员的抗花柳病运动的经验并积极倡导之^[17]。

需要指出的是，《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的国外卫生管理经验涉及了多个国家，其中尤其关注苏联的卫生建设经验，在30篇介绍国外公共卫生建设的文章中，关于苏联的文章就有11篇，内容涉及苏联的全国卫生建设、疾病卫生管理、医疗保险体系等。除了前文提到的《苏俄之抗花柳病运动》一文，还有《苏俄医事设施的改革》(第98期)、《苏联之产母婴儿保健事业》(第101期)以及《苏联保健卫生事业概况》(第360、361期)等。在编印成册的《医学周刊集》第五卷当中，丙

寅医学社还专门将其中五篇文章归为一栏，名为“苏俄医事”，对苏联卫生建设进行集中介绍，以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之参考。

苏联的卫生管理经验能得到如此关注，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处于合作关系的国共两党相继派员留学苏联，由此形成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这与同时期经济危机下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中国社会舆论开始对苏联体制抱有好奇^[18]。另一方面，苏联的卫生制度实践了“将医疗普及到民间去”的理念，《苏俄医事设施的改革》一文对此进行了论述，全面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成就。作者在文中谈到，苏联进行医疗改革，建立全国的统一医事组织、普及医疗设施，实行免费治疗、大力培养医务人员以及注重疾病之预防，“目的在于使一般公民都有享受的机会。全世界上，还没有一国能实行这种制度”。而实行这种制度之后，全俄的人口死亡率以及婴儿死亡率从1913年的27.3‰和270‰降到了1923年的23.7‰和170‰。最后，作者总结说，“于战争饥荒疾病分走之中还能得到如此结果，不能不令人惊服苏俄卫生事业的进步了”^[19]，并对苏联这种将预防与治疗相联系，把民众福祉与医学建设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卫生行政体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为赞许，倡导学习。可见，丙寅医学社所认同的，正是苏联卫生行政体系对于保障全民健康之功效，这也恰恰符合了医学社倡导公共卫生以谋求民众福祉的目标。

2.3 对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建言

除倡导和参考国外经验外，丙寅医学社也注意到了国内公共卫生建设的问题，陈志潜在谈论医学社的努力方向时曾说过，医学社要“监督中央及地方各卫生行政机关，务求任用

专门人才，以研究和成立国家急欲举办之公共卫生建设事业”^[20]。换言之，即在监督国家卫生行政机构的基础上，要求国家通过采纳并推行各类卫生行政人才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并完善公共卫生的管理。因此，对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促进中国公共卫生行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方向。从统计结果看，其公共卫生建言献策类文章总共有51篇。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全国不少地区都开展了乡村卫生建设实验，这受到医疗卫生界的普遍关注，加之陈志潜本人致力于乡村卫生工作，这使得《大公报·医学周刊》成为讨论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

讨论乡村卫生建设的文章有多篇为陈志潜亲自主笔，主要介绍了其工作经验特别是定县农村卫生工作经验。相应文章有《演讲：定县卫生工作》（第207期）、《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农村卫生实验》（第226、227期）以及《谈定县的保健员》（第284、294期）等。

如在《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农村卫生实验》一文中，陈志潜认为，要在定县这样一个医疗卫生水平还极度落后的地区实现保障农民健康的目标，就要扎根基层，构建起一套自下而上的由村保健员、区保健所和县保健院相互配合的三级卫生行政体系。具体而言，村保健员负责防疫和卫生宣传工作，同时对村民进行“生死报告”的登记；区保健所负责一般的门诊治疗，同时督导村保健员，并管理学校和母婴卫生工作；县保健院则对医院进行管理，同时督导区保健所，并负责传染病管理、卫生教育和人员的培训工作^[21]。在三级网络中，陈志潜特别注重村保健员的作用，在《谈定县的保健员》一文，他进一步阐述了设置乡村保健员的两大原因：其一，“今日推广科学医药，不能不想到乡间人民交通之不便，为便利农民就近实用

科学起见，我们不得不设置保健员”；其二，“现在训练一个医生是不容易的……我国全国四万万人民，只有四千个合格的医生。要拿四千个医生来管理四万万人民的健康，那就是每个医生得管十万人”，这是不实际的，而与医生相比，保健员的训练成本要低很多^[22]。以保健员的设置来应对农村的基础医疗问题，将医学知识由保健员主动地传播到基层去，这种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体系，正是陈志潜所极力倡导的。

除陈志潜外，其他医界人士亦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撰文发表了个人对于乡村公共卫生建设之看法，如第241~242期连载的《我国乡村卫生成功之途径》，作者在文中为中国乡村卫生建设提了几点建议：其一，加强专业卫生管理人才和专业医师的训练，并增设医疗卫生训练组织；其二，根据中国南北的生活差异，设立华南和华北两个卫生厅；其三，“中央政府要积极协助各县改进卫生事业之方法”^[23]。其他文章，诸如《山东菏泽试验县的概况调查及其筹备医药卫生之建议》（第228、230期）、《最经济的乡村卫生医疗组织》（第257期）以及《乡村卫生建设》（第292期）等也都涉及乡村卫生建设。

除了乡村卫生建设外，公共卫生建言献策类文章还涉及了其他内容，例如卫生行政之建议、卫生行政人员之训练以及具体的卫生防疫问题。相应的文章有《为西北卫生建设者进一言》（第276期）、《训练卫生行政人员的建议》（第214期）以及《水灾区域宜及早注意防疫工作》（第303期）等。

3《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和影响

作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重要的医学类刊物，《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

生的认识，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首先，《大公报·医学周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同时又具有一定特色。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公共卫生对于保障国民健康的重要性，倡导公共卫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大公报·医学周刊》是当时医界知识分子讨论新医的平台，就公共卫生类文章看，其主要撰稿人除了陈志潜和朱章赓等人，其余大部分来自医学社外，可见，其所宣传的公共卫生理念并非一家之谈，而是当时医界人士观点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一些医学刊物看出，例如中华教育促进会与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合办的《卫生月刊》以及上海医师公会主办的《新医与社会汇刊》，这两种刊物均对公共卫生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卫生月刊》，其办刊宗旨即为宣传公共卫生。这两种刊物的公共卫生宣传工作与《大公报·医学周刊》一样，在倡导公共卫生的同时，兼顾介绍国外的卫生管理经验并发表一些针对卫生行政的建言献策类文章，而在进行这些工作时，这两种刊物也都紧紧围绕国民健康与国家民族兴亡的议题展开，这也是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之意义的普遍认识。但是，与两者相比，《大公报·医学周刊》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作为社会团体创办的刊物，与《卫生月刊》相比，《大公报·医学周刊》着重于展示当时社会各界对公共卫生的认识，因而，其相关文章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民间人士对公共卫生的倡导与建言，并不代表政府的话语。而《卫生月刊》由政府部门主办，以宣传中央和各地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尤其是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卫生政策为主，反映了当时政府部门对公共卫生的态度。第二，与《新医与社会汇刊》相比，《大公报·医学周刊》更

加关注于乡村卫生建设，刊登了多篇涉及乡村卫生建设，尤其是定县乡村卫生建设的文章，阐述了乡村公共卫生建设对于保障民众健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这受到当时各地乡村卫生实验开展的影响，也与其主编陈志潜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密不可分。而《新医与社会汇刊》由上海医师公会这样一个专业的医学组织主办，其传播宗旨在于利用西医知识普及日常卫生常识，公共卫生只是被部分提及，并且，其主办单位上海医师公会的主要活动范围局限于上海市内，因而，其公共卫生宣传以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为主。

其次，《大公报·医学周刊》对于公共卫生的一些构想得到当时社会的高度评价，部分理念后来为政府所采纳。第一，陈志潜在《大公报·医学周刊》中宣传的定县乡村卫生建设经验在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甚至亲自到定县学习经验，不少刊物也报道了定县的乡村卫生实验，甚至直接转载了陈志潜发表在《大公报·医学周刊》上的《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农村卫生实验》一文。与此同时，“三级保健网”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定县经验。第二，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中央通过《实施公医制度以保证全民健康案》，同意将公医制度纳入国家卫生行政体系当中。这一提案提到了政府保障国民健康的问题，这与《大公报·医学周刊》在倡导公共卫生之意义时反复提及的“政府为民众健康之责任者”的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大公报·医学周刊》极力宣传

的苏联卫生管理经验也被国民政府所采纳，并被部分应用于中国的公医制度中。可见《大公报·医学周刊》所宣传的公共卫生理念是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刊物都对定县经验和苏联模式等给予了持续关注，因此，并不能表明这一系列的反响就是《大公报·医学周刊》公共卫生宣传工作的直接效果。但是，《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的部分公共卫生构想和理念无疑是当时主流思想的体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倡导公共卫生的思潮，而也恰恰是这样的思潮，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4 结论

自甲午战败，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医学被赋予了保国保种，救国救民之责任，医学的意义已不仅限于个体的疾病治疗，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公共卫生开始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励行西医传播的丙寅医学社开始以《大公报·医学周刊》为载体，对公共卫生进行集中宣传。其公共卫生宣传工作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普遍认识，与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外，其对于公共卫生建设的部分构想和理念也受到了当时民间和政府的认可，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可以说，《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传工作是有效果的。《大公报·医学周刊》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再现了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努力，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公共卫生的重要阵地。

参考文献

- [1] 王勇, 王影.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J]. 医学与哲学, 2011, 32(11): 74-76.
- [2] 曹丽虹. 试析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102-106.

- [3] 陈志潜 . 发刊漫谈 [N]. 大公报, 1929-07-03(13).
- [4] 田立忠, 冯志军 . 《大公报》副刊(津版时期)研究综述 [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1(12): 94-95, 98.
- [5] 欧结成 . 当中医遇上西医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6] 遂初 . 卫生行政 [N]. 大公报, 1931-02-12(10).
- [7] 刘娟 . 从《大公报·医学周刊》看民国时期卫生观念的传播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5): 98-117, 128.
- [8] 陈志潜 . 我国急应实施公医制度 [N]. 大公报, 1933-03-07(11).
- [9] 朱季青 . 医学五化论 [J]. 医学周刊集, 1930, 3: 11.
- [10] 季青 . 公共卫生与人类幸福 [N]. 大公报, 1934-06-19(11).
- [11] 苏病 . 北平市第一次卫生动员大会袁市长演说词摘要 [N]. 大公报, 1934-05-22(11).
- [12] 编者 . 由急赈想到市政 [N]. 大公报, 1933-07-25(11).
- [13] 胡一峰, 尹媛萍 . 建设“新医”的努力——《医学周刊集》与丙寅医学社研究 [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 26(2): 122-134.
- [14] 朱季青 . 世界公共卫生行政之新趋势 [N]. 大公报, 1933-07-18(11).
- [15] 袁浚昌 . 新墨西哥国水灾时防病的经验 [N]. 大公报, 1931-08-27(10).
- [16] 朱季青 . 参加美国公共卫生学会拉杂谈 [N]. 大公报, 1932-01-13(10).
- [17] 揆 . 苏俄之抗花柳病运动 [N]. 大公报, 1931-08-20(10).
- [18] 骆晓会 .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的试验 [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0(6): 5-10.
- [19] 言者 . 苏俄医事设施的改革 [N]. 大公报, 1931-07-16(10).
- [20] 陈志潜 . 丙寅医学社今后努力之方针 [J]. 医学周刊集, 1930, 3: 6.
- [21] 陈志潜 . 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农村卫生实验 [N]. 大公报, 1934-01-17(11).
- [22] 陈志潜 . 谈定县的保健员 [N]. 大公报, 1935-03-12(11).
- [23] 侯子明 . 我国乡村卫生成功之途径 [N]. 大公报, 1934-05-08(11).

(编辑 涂珂)